

MORAL TEACHING IN COLLEG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1927~1949)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1949年)

张均兵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MORAL TEACHING IN COLLEG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1927~1949)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1949年)

张均兵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 ~ 1949 年/张均兵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112 - 0973 - 3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27 ~ 1949
IV. ①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817 号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 ~ 1949 年)

著 者: 张均兵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武 宁

责任编辑: 朱 宁 杨 娜

封面设计: 曾秀芳

责任校对: 徐为正 杨 璐 王震雨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5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0973 - 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一、研究的意义	/ 1
二、关于“训育”概念的界定	/ 2
三、研究综述	/ 4
四、研究中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 9
五、研究的方法	/ 10
第一章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理论体系与组织机构	/ 11
一、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阶级本质	/ 11
二、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理论渊源	/ 14
三、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理论体系	/ 24
四、自上而下的大学训育组织系统	/ 42
第二章 国民政府显性训育在大学的建立与实施	/ 57
一、党义课的课程、师资建设与效果评价	/ 57
二、军事训练课的课程、师资建设与效果评价	/ 80
三、体育课的课程建设与效果评价	/ 91
第三章 国民政府隐性训育在大学的开展与实施	/ 97
一、推行导师制	/ 97
二、准许学生自治, 但进行严格限制	/ 108
三、建立国民党和三青团基层组织	/ 117
四、整顿学风	/ 123
五、制定校训和校歌	/ 126



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 134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教会大学的人格教育	/ 147
一、重视人格教育是教会大学的一贯宗旨	/ 147
二、教会大学重视人格教育的原因	/ 148
三、教会大学人格教育的形式与特色	/ 151
四、对教会大学人格教育效果的评价	/ 163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大学的训育活动	/ 166
一、加强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	/ 166
二、广泛建立和开展社团活动	/ 178
三、支持和引导进步师生的爱国活动	/ 183
第六章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 193
一、大学训育的指导思想及其训育内容没有与时俱进	/ 193
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训教分离的弊端	/ 196
三、没有营造良好的训育环境，致使训育的各项措施难见成效	/ 198
四、大学训育的方式、方法多元化，但存在诸多弊端	/ 201
五、重视大学训育人员的队伍建设，但过于强调政治素质而轻视业务素质	/ 208
结语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主要启示	/ 209
一、训育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 209
二、坚持训教合一，将训育与教育相融合	/ 211
三、大学训育必须处理好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工具价值和人本价值的关系	/ 212
参考文献	/ 215



绪 论

一、研究的意义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大学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训育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企图通过政治教化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国民政府的大学训育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又在借鉴西方训育思潮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适应国民党一元化的政治教化而设计的训育体系，与大学追求学术自由、民主独立的本质特性相矛盾。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学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各种政治思想、观念在大学中传播和交锋，国民政府欲以三民主义统一大学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则在大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启蒙。国共两党在大学训育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国民党的训育不断遭到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却逐步得到师生的支持和认同，并成为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在大学的组织建设上，国民党的组织力量 and 影响不断削弱，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 and 影响则不断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导致国共两党地位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现代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国民政府的大学训育很有意义。历史学的研究“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要提供种种比较，帮助理解当前。”^①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大学训育虽然受其阶级本质的制约在宏观上并无可取之处，但微观上许多做法却有研究价值，从中吸取有益之处，这对改革和完善中国当前大学德育会有一定的帮助。不仅如此，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研究中共自身，又要研究革命对象所统治的社会各领域，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展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及其原因。因此，研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学训育，有助于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化。

^① [美]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M]. 王承绪, 徐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8.



二、关于“训育”概念的界定

在“训育”的内涵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学校的训育,是一个特殊问题,是在智育、体育之外的德育。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与智育、体育分不开来。训育是教育整体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训育之意义,就狭义言似为教育之一部分,就广义言应为教育之全体。”^①中外教育家都倾向于将其归入道德教育的范畴,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赫尔巴特认为:“对青少年的心灵产生直接影响,即有目的地进行的培养就是训育。”^②

李相勋认为:“训育以培养高尚品格为目的,故一名德育。”^③

徐庭达认为:“训育之意义,以希腊源词意为教诲,训练,陶冶,即使人之思想行为,均合于理想,英语则谓‘道德训练’,中国虽无此名词,但古代之‘教’近似,后之学者,引申其意不外陶冶人之性格培养道德而已。”“而于训育解释,分消极积极两方面:就消极方面言,在如何消除学生不安状态,指导其活动,转移其性格,灌输知识,启发陶冶完美人格,就积极方面言,在如何设计组织系统的理想环境及机会,使学生于实际生活中,训练培养社会的公民的道德行为及时代所需要之性能。”^④

杨贤江认为,训育不仅包括讲解伦理,而且包括养成早起习惯、纠正行为、引起学习动机等等。“训育是教育的一种作用,足以达到教育的目的的。”^⑤

汪少伦对训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训育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训育普通通称为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或道德训练(Moral Training)。此种名称英、美学者最常用。”“训育既为道德教育,而各种道德行为养成习惯以后构成一个人的品格(Character),如是训育又有人称为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或品格养成(Character-Making)。此种名称在欧美各国均常用。”“训育既为道德或品格教育,而道德与品格均重在行或行动(Action, Handling)。而行或行动发源于意志。意志、感情及理智同为整个心灵的三个

① 许椿生,陈侠,蔡春.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49.

② [德]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M].李其龙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7.

③ 李相勋.训育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④ 徐庭达.训育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36.1~3.

⑤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杨贤江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222.

方面。道德或品格教育既重在行，行又属于意志，所以道德或品格教育又有人称为意志教育（Willensbuilding, Education de la Volonte）。此种名称在德法两国最通用。”“合于道德的行为由个人方面看来，为道德修养，为优良品格，为健全意志，由社会或全体方面看来则为纪律（Dicipline）。因此训育又有人称为学校纪律（School Dicipline）。此种名称在美国最通用。”“训育目的既在养成道德行为或优良品格，而研究道德行为或优良品格的学问普通称为伦理学（Ethics）或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因此训育即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学生行为方面的应用，而训育亦可称为应用的伦理学（Applied Ethics）或教育伦理学（Educational Ethics）。”“以上各种名称表面上虽极不一致，但所指之事象则一。即均认训育为整个教育工作中关于培养被教育者善良行为的一部分。”“以上认训育为整个教育的一方面，系一种狭义的解释。广义地讲起来，训育不仅是整个教育的一方面，而且是整个教育的一种方法。质言之，即用管理、指导等方法，使学生求得各种知识，如各种精神生活管理，和关于知的各种活动指导；使学生求得各种技能，如关于能的活动指导；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体格，如关于物质生活管理与关于健的活动指导之类，于以使整个教育目的完全实现。目前各国学校训导工作均包括健、贤、智、能各方面，训育人员并不是警察，专门注意学生过失。”^①在这里，所谓“精神生活的管理，就是关于教室、自修室、阅览室、实验室、以及各种实习场所的管理”^②。所谓“物质生活的管理，就是关于学校的衣、食、住的各种规定或命令”^③。所谓“健、贤、智、能”，在汪少伦看来，“体格教育的目的在‘健’，习惯教育的目的在‘贤’，智识教育的目的在‘智’，技能教育的目的在‘能’。所以‘健’、‘贤’、‘智’、‘能’四者为整个教育的四方面，亦为整个教育的四大理想”。^④

徐蕴晖认为：“训育就是使儿童具有明了的道德的观念及道德的判断，培养儿童善善恶恶及爱真理和美的情操，并使意志活动恒趋向于道德，克服违反道德的种种诱惑而具有决定道德行为的动机及实行的能力。”^⑤

在台湾的有关著述中则认为，民生主义教育的内容，包括智育、德育、

① 汪少伦，训育原理与实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2~4.

② 同上，153.

③ 同上，144.

④ 同上，2.

⑤ 徐蕴晖，小学训育制度的研究[J]，教育杂志，1928，20（2）：1.



体育和群育。“而学校教育之设施，除智育外，其他三育，皆属训育之范围。”^①“学校教育之设施，德、智、体、群四育皆与训育密切相关。”^②“国民教育之训育实施，以《公民训练》为主。《公民训练》为清末《读经》《修身》，及民初以来的《修身》《公民》《党义》《卫生》等学科中关于道德、卫生必须力行部分。包括我国的固有道德、新生活规律以及现代之国际道德观念。”^③“训育在于陶冶健全之品格，培养实践道德能力，养成完全之人格。”^④

结合以上各种观点，可以对国民政府所用的“训育”概念的内涵作出界定：“训育”，是以“德育”为核心，涵盖“智育”、“体育”、“美育”、“群育”中的精神陶冶，运用“显性训育”（主要指党义课、军事训练课、体育课等）和“隐性训育”（主要指校园活动、师生关系、教师对教学所持的态度、学校提倡的东西、校内的舆论导向等）手段，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有目的地对青年的心灵施加影响的教育。由于国民政府在实施训育的过程中，其实践与理论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再加上国民政府时期“训令”、“训词”、“训诫”满天飞，又塞进私货，使“训育”这个本是“教育”的概念变成带“政治”色彩极浓的概念，以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训育”的反感和抵制。

三、研究综述

（一）解放前的研究情况

1. 专著类研究

解放前出版了一些训育研究的专著。如徐庭达的《训育研究》（1936年）、汪少伦的《训育原理与实施》（1943年）、李相勛的《训育论》（1935年）、高觉敷的《青年心理与训育》（1942年）等。这些专著都对训育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都认为训育可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都主张应提倡积极训育。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Z]。台北：正中书局，1974。总1403。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Z]。台北：正中书局，1987。总1437。

③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Z]。总213。

④ 教育百科全书[Z]。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3。368。

徐庭达在《训育研究》一书中认为,训育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其方式主要有规律式、自由式和人格感化式,这三种方式各有其缺点。训育原则有:要积极启发,并建设,少消极限制;要间接教授,少直接教授;所希望学生之反应,要为所能达到,或理解;要以人类理想活动为经,以各种知识为纬;好习惯,养成律;训练理想性格,即牺牲性、坚忍性、冒险性、勤苦专一性、自信、群性。训育的方法有积极与消极两种。训育消极方法,偏重于消除学生不安状态,指导并管理学生的行为,利用知即行的哲理,启发学生上进的自觉心。其方法主要有:道德或公民之知识教学;会训及个别训导;管理;个人奖励与团体奖励;名誉制裁、社会制裁与物质制裁;校风之陶冶;自己修养。训育积极方法,即设计组织社会化教育环境,与集体活动机会,由现实生活中,训练陶冶理想的行为及个性。其方法主要有:课内活动;课外生活;学校宿舍生活;学生自治活动;学生军事生活;校外生活,如旅行、课外作业或实习等。

汪少伦在《训育原理与实施》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设施多效法欧美,致使中国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完全丧失。“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员尤应使其本身先成为一个训育者或教育者(Educator),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教师(Teacher)。”^①应加强训育的研究,训育的研究可分为理论与实际两方面,前者研究各种对于训育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后者研究各种训育工作实施的方法。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可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种。所谓客观的研究,即研究支配儿童或青年行为的各种因素。最主要的有四种:遗传、发育、性别、环境。所谓主观的研究,即确定训育者的理想。关于实际方面的研究,主要的也可分为两种,即训育的组织与训育的方法。训育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确的训育理想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必须适合时代性;必须适合民族性;必须有高尚的理想。训育的方法包括:管理;指导;赏罚;直接或间接训育讲授;训育综合法,如中心训练周。

李相勛在《训育论》一书中认为,训育的大部分工作在养成学生的高尚理想和正当习惯,并非是完全纠正错误方面的工作。训育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任务,积极方面的任务比消极的还重要。训育的目的,在个人方面,是养成自治的能力;在团体方面,是养成牺牲自我而为公众谋幸福的精神。学校训育需要养成优良的校风。优良校风的四大要素为:教职员彼此和衷共济;

^① 汪少伦,训育原理与实施[M].7.



学生间彼此有良好的感情和友谊；师生间有良好的感情；社会的扶助。养成优良校风的方法有：使学校环境美术化；注重全校的集会；鼓励各种学生团体的组织；增进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关系；努力教学。直接道德教授有利有弊。其好处是：可以授予种种道德的知识；可以提高道德的标准；表示学校方面注重德育。其不利之处是：仅偏重知识而忽略行为的危险；使学生行为受意识控制的危险；有容易使其他教师忽略德育的危险。将课外活动的宗旨和价值归纳为：训练良好公民；训练领袖人才；发展创造能力；养成合作精神；养成适当休闲生活；养成良好校风；锻炼健全体魄；可以适应个性；实现社会化的教育；增进学生的学业；增进学校和社会的关系。

高觉敷的《青年心理与训育》一书，主要侧重训育理论的一般研究。该书分析了青年期的意义与重要性；青年期生理的、情绪的、社会的、道德的发展特点；对正常青年、心理失常青年与犯罪的青年施以不同的训育；导师的培养等内容。

2. 零散研究

一些教育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民政府大学训育作了较为零散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散见在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潘光旦、竺可桢、任鸿隽、胡适、张伯苓、杨贤江、李建勋等人的著作中。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了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反对思想专制，主张民主、自由。对国民政府的大学训育政策的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困境等有所探讨。例如，竺可桢重视总理纪念周这一训育形式，但反感当时和尚念经式的方式；对国民党纳粹式的管理方式不满，认为党团应该退出学校；认为军事训练适应了当时抗战的形式，但是流入军国主义则是不足取的；反对特务式的导师制，重视本原意义上的导师制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蔡元培和任鸿隽都认为党化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目的是背离的，主张教育独立。潘光旦对学生自治的走样作了深刻剖析。李建勋认为导师制因存在人选、任务分配、时间、经费等问题，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国民党的训育法令太繁杂、定位不一、矛盾迭出；训育机构职责不清，无所适从。陶行知认为，国民党党德败坏是党化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并针对当时党化教育的弊端，提出了改良建议。

国民政府的当政者在不同时期对其训育实施状况作了反思。例如，蒋介石本人曾哀叹过：“在抗战以前，我们全体国民和一般青年，实际上并没有普遍受着三民主义的教化，就是在抗战之中，也还不能真诚一致的信奉三民



主义，这固然是国家的不幸，实在也是我们教育行政方面以及教育界共同的耻辱。”^①

从总体上看，解放前虽然出现了一些训育研究的专著，但是由于这些专著的成文时间较早，因此对国民政府后期的训育理论与政策及其实践等没有涉及，这是当时的训育专著共有的不足。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例如，高廷梓在《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指出：“对这问题，一般人是没有兴趣写探讨的文字。至于本党同志哪，有些因为职务的关系，觉得不便公开发表意见。有些或者以为事体过于重大，非个人能力所及，提出讨论没有什么益处。”^② 总之，解放前对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全面性、理论性和系统性。

（二）解放后的研究情况

1. 大学校史类研究

解放后编写了许多大学校史。一方面，在这些大学校史中，多从学校管理、教学以及师生生活的角度对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训育作了初步地整理和归纳。例如，《武汉大学校史》中谈到，由于校长王星拱对导师制和发展党团组织极不热心，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评与督促。在《南开大学校史》中认为，私立时期，办学相对自由，长时间没有开设党义课，可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不得不根据教育部的训令开设三民主义和伦理学课。南开大学注意结合学校的融资方式、办学成因等进行感恩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复旦大学志》中认为，私立时期，民主自由的气息较浓，可是改为公立后，民主自由的气息大不如从前，不得不在校内设置了训导处。另一方面，这些校史对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多是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去展示了不同时期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这些与训育密切相关，但是只涉及某一类型、某一个大学的训育概貌的陈述，缺乏全面性、理论性、系统性和可比性。

2. 德育思想史类研究

解放后出现了一些研究德育思想史的专著。龚海泉等主编的《20 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德育卷》，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展开，从社会变迁、意识形态、学术理念、教育实践、思想文化发展的视角入手，全面而深刻地审视了 20 世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总 83.

② 高廷梓. 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 [J]. 中央周刊 (新年特辑), 1939, 1 (21、22 合刊): 24.



纪的中国百年德育,其中部分章节对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共两党在大学的德育思想、制度建设及其实践作了粗线条的梳理和理论分析。张锡生主编的《中国德育思想史》,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系统地研究了近代德育思想的变迁。罗炽等著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纲》,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背景的基础上,论述了各时期的思想流派尤其是代表人物的德育思想及其特点。

3. 专史类研究

解放后出现了一些专史类著作。郑航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和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论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包括修身教科书)的发展状态和演变历程。有关教会大学史的专著主要有《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近现代教育与基督教》《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等。以上专著在不同的章节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国民政府时期教会大学的训育思想、课程设置、训育途径及实施效果等。有关中国私立大学的研究成果较少,而能够涉及私立大学训育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仅在一些私立大学的校史、校友回忆录、人物传记中有所反映。宋秋蓉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一书,从教学管理的角度提到了考试信誉制和宿舍点名制,还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特征和精神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4. 通史类研究

解放后出现了一些通史类著作。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和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等,这些著作从人物、流派、历史事件或教育活动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的大学训育。

5. 相关研究

解放后出现了一些与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相关的著作。例如,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现代部分),对国统区大学与解放区大学的思想政治课作了比较研究。周川、黄旭主编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收录了50位有影响的近代大学校长,对各大学校长的训育思想多有涉及。许美德著(Ruth Hayhoe)、许洁英译的《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第2章,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高等教育状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状况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从文化冲突



的角度,探讨了影响近代中国大学的各种因素。张彬的《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浙大导师制的实施状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浙大导师制接近本原意义上的导师制,因而取得了较好的训育效果。

从总体上看,解放后与本论题相关的诸种研究中,有的侧重大学训育的个案研究,有的侧重代表人物的训育思想研究,有的侧重训育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有的是从教学和管理的角度间接提及,有的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和陈述。因此已有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零散,理论性和系统性差,还不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整体状况,更缺乏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训育作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此课题的研究有诸多困难:一是研究国民政府大学训育,不仅需要了解大学本身的发展脉络,还要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背景;二是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资料、档案文献比较分散,要想充分掌握它已非易事,再想在此基础上归纳清理脉络线索,并做深入的研究,更是不易;三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个体差异极大,又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大学,训育实施情况千差万别,在各个时期,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以及各大学的微观变化也都有所不同。以上原因造成了该课题的研究一直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四、研究中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 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关系

宏观视角把国民政府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中观视角则把国民政府大学分为几个大类,如按照举办主体分类,可划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按照学科门类划分,又可分为工科、法政、商科、农科、医科、师范等。大学种类不同决定了其训育也各有特色。微观视角则着眼于每个具体的大学。为方便研究,本文将以宏观层面的研究为基础和主体,兼顾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二) 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由于大学的历史传统、办学成绩、社会和国家的支持程度的差异,国民政府大学和世界近现代大学一样,也是分层的。本文以研究著名大学的训育为主,兼顾一般大学的训育。例如,主要侧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等。



(三) 大学训育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

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学训育的职能,要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来实现,研究国民政府大学训育必然要涉及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论文涉及的主要是国民政府大学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柯桢、潘光旦、陶行知、李登辉、司徒雷登等,研究他们的训育思想对大学训育的影响。

五、研究的方法

(一) 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文献分析法。在研究中收集、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档案文献、报刊、期刊、校史资料、校史、校刊、校友回忆录、文集、人物传记、论著等,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与梳理的基础上,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对大量文献进行反复研究与思考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 整体研究法、分类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本书以国民政府大学训育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考察其训育的阶级本质、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途径、组织机构以及形成发展过程等,以把握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概貌。其次,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本身进行了分类研究。把国民政府大学中具有特色的教会大学单独抽取出来进行研究。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研究对象,在整体研究法与分类研究法的基础上,又运用了个案研究法,如对浙江大学的导师制的研究。

(三) 比较研究法

在个别章节,为了深入阐述某个问题,也运用了比较研究法,最突出的就是国共两党的训育对比。例如,为了深入说明国民政府在大学训育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训育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没有与时俱进,对国共两党在大学训育的指导思想、内容等作了对比研究。



第一章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理论体系与组织机构

一、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阶级本质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具有浓厚封建买办性质的法西斯独裁专政，极力扼杀革命，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宣扬和鼓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为巩固其独裁政权，在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训育理论体系和训育制度，对学生实行反动的奴化教育，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国民政府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大学训育的阶级本质。国民政府大学训育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极端的反动性。其表现有：

（一）培养学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意识

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因此，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同时，在大学训育方面，极力加强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意识教育。国民党为维护一党专政，从孙中山手中接过“党化教育”的口号，企图以三民主义感化“误入歧途之青年”。1927年《浙江省政府党化教育大纲》中指出：“纠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策略之错误，救拔具有革命性而误入歧途之青年，以三民主义感化之，及其各种力量铲除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员。”^① 1928年7月28日，《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关于白崇禧提议实行三民主义化教育案致国民政府代电》称：“一般青年学子因管教之不严，或干预政治，越俎代谋，或曲解学说，误入歧途，贻害政治社会，莫此为甚。今应责成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严加整顿，使课目学位名副其实，并实行三民主义化，树立教育之精神，以固党国

^① 教育界消息栏 [J]，教育杂志，1927.19（8）：3。



百年之基础。”^① 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以巩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国民政府要求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的规约；以“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等。在学校设置党义课程和总理纪念周、审查教材、检定党义教师、实行军事教育等强化党化教育的措施，妄图以篡改过的三民主义教育来抵制共产党“偏激之教义”。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仍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采取防共、溶共、限共的政治立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加以迫害，在大学训育上坚持“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主义的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窃取胜利果实，准备内战，对收复区的青年学生进行思想训练和甄别，对于毕业生要求交《三民主义》和《中国之命运》两书的阅读报告。其实质是把青年学生的思想禁锢在信仰一个主义、维护一个政党以及服从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上。对失业或失学青年学生，国民党采取诱骗或强制性措施进行反动的政治训练，抵制人民革命。1948年8月5日，教育部呈请蒋介石要求“集训流亡学生，培植反共干部”被允准后，下令将教育部收容的14000人中的高中毕业生及18岁以上的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控制或镇压。1949年国民政府在临近败亡前，还专门在广州召开所谓教育行政检讨会，以整肃学风和加强学籍管理为名，进一步加强对师生的控制。其规定有：从严取缔罢教罢课，如劝导无效，即行解散，取消其教研学习资格；严禁学生假借名义干涉校政；严禁借壁报、漫画及秧歌、歌曲等为共产党宣传的活动；肃清校内的共产党人。在讨论道德教育问题时，国民政府提出要加强各级学校对学生的精神训练，激发反共意识，奖励各校教员从事反共演讲及反共著述等。这些都说明国民政府大学训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意识，因而具有很强的反动性。

（二）主张专制独裁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篡夺革命政权后，为维护城乡豪绅买办阶级的独裁统治，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所谓“党化教育”，严令所有教材图书必须符合国民党党义；指使各级党部直接派员以教师身份控制学校教育，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Z]·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010.